

社会主义中国 文化政策的转型

上海工人文化宫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

胡霁荣——著



社会主义中国 文化政策的转型

上海工人文化宫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

胡霁荣——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上海工人文化宫与
当代中国文化政治/胡霁荣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6

ISBN 978-7-208-13766-0

I. ①社… II. ①胡… III. ①文化事业-方针政策-
研究-中国-现代 ②文化馆-文化史-研究-上海市-现
代 IV. ①G120 ②G24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8810 号

责任编辑 马瑞瑞

封面设计 范昊如

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

——上海工人文化宫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

胡霁荣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283,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766-0/G·1796

定价 58.00 元

序 言

荣跃明 *

胡霁荣博士的著作《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即将付梓，嘱我写序，使我有机会一窥一位学术新人的研究和探索，真切感受当下学界新生代读书思考看问题的学术理路。进入新世纪以来，原先活跃在学界的前辈学人随着年龄增长，陆续退休或退出一线，学界代际更替已经开始。新生代学人成长于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受过良好学术训练，其中不少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胡霁荣博士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了她的学业。新生代学人大多没有社会实践经历，走出校门就直接进入学术领域，这使他们的研究工作明显区别于前辈学人，显然缺乏社会阅历和体验，但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运用的良好训练，使他们的研究以学术敏感和理性思辨见长。胡霁荣博士的新作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当代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正在展开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文化政策转型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当代有关中国文化政策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讨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和文化产业发展，当下有关文化政策研究的现实关怀，与我国文化发展正在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文化事业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经营

* 荣跃明：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性文化产业这种两分法的文化发展模式转变有关。而《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独辟蹊径，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发展史为个案，通过对其在不同时代的荣辱兴衰和辉煌沉寂的历史描述，研究分析在这一个案上折射出的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的演变轨迹。就我的专业兴趣和阅读所及而言，以这样的案例和方法来做研究还真少见，无疑让人眼睛一亮。

针对社会主义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文化政策转型，本书以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通过田野考察和档案搜集，运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概括了工人文化宫在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作为空间生产场域再生产社会主义文化和工人阶级意识的生产机制，以及与国家文化政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作者重点讨论了文化政策转型对文化生产过程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并创意性地提出了一个象限结构来直观描述这种变化，使人可以通过对比清晰地感知市场经济体制在原有文化生产结构中衍生出的新内涵，以及对于文化生产过程变化的影响。据此，作者深入讨论了国家文化权力与市场经济理性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评价了工人文化宫在社会转型背景下面临的挑战、冲突和自身转型发展的前景。

工人文化宫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体制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方式中的一种形式。从体制化视角看，可以将其归入新中国群众文艺的大范畴。实际上，群众文艺不仅仅具有工人文化宫的体制化形式，还有散落在广大民间社会的多种非体制化形式，如民歌、民俗、民间戏曲和乡村庙会等多种形式。在计划经济时代，以非体制化民间形态存在的大量群众文艺被贴上了封建迷信标签而被禁毁，其中只极少部分经改造进入了体制化的社会主义文艺。而这恰恰是计划经济体制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条件，反而抑制了文化生产能力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激发社会主义文化生产能力和扩大文化资源创造了条件。而事业体制的工人文化宫虽然遭遇经济体制转型之痛，但其伴随新中国成长而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源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工人文化宫的未来发展在公共文化和当代中国群众文艺发展中有着无可限量的光明前景。

“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是一个宏大主题，但这一主题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挑战。处理这样一个宏大主题当然可以有多种方法，一

般会采用政策过程分析，或者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进行宏观论述，等等。而作者以档案文献和口述史资料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由此构建了一个有关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演变的理论框架，较为成功地处理了学术研究中材料与理论方法的相互关系。工人文化宫的个案无疑为研究文化政策转型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实证基础，但作为个案材料也限制了对这一宏大主题所包含丰富意蕴的充分展开，给人以“小马拉大车”和意犹未尽之感。此外，海外学术训练的经历使作者在方法理论和概念使用上多少还留有与本土学术的疏离。

尽管如此，作者敏锐的学术目光和为做田野调查所付出的艰辛值得嘉许，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理论逻辑，特别本书是开拓了一个以计划经济时代留存至今的建制化群众文艺样本——工人文化宫研究的新领域，展示了作者作为学术新人的治学能力和学术勇气。如假以时日，作者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是可以期待的。

是为序。

2014年6月28日于沪上

目录

序言 / 1

导言：文化政策研究与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 / 1

一、选题由来 / 1

二、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6

1. 文化经济学取向的文化政策研究 / 6

2. 文化研究取向的政策研究 / 8

3. 本书的研究视角：文化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社会学的综合 / 9

三、研究方法 / 11

1. 个案研究：工人文化宫 / 11

2. 嵌入式个案研究 / 12

3. 档案分析 / 15

4. 实地调查 / 16

5. 采访与深度访谈 / 16

四、研究目的 / 18

五、研究结构 / 19

第一章 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起源 / 21

一、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 21

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与工人运动 / 23

三、党的文化政策理论与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的形成 / 26

1. 党的文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化发展 / 26

2. 党的文艺意识形态的原则与标准 / 28

3.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与新中国文化格局的确立 / 30

小结 / 33

第二章 崭新的缔造：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的工人文化宫 / 35

一、工人文化宫的建立 / 35

1. 工会立法及政策文件出台 / 38

2. 行政管理结构与制度设计 / 42
3. 经济结构与经费资产管理 / 44
4. 服务对象与主体 / 46
- 二、工人文化宫的定位与功能 / 47
 1. 文化启蒙 / 48
 2. 提供文化体育休闲服务 / 50
 3. 组织业余文艺活动与培养工人文艺人才 / 52
 4. 文化交流与对外展示 / 55
 5.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工人文化宫功能的变动 / 56
- 三、工人文化宫与城市空间生产 / 59
 1.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建宫史 / 59
 2.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集体记忆 / 65
- 小结 / 71

第三章 时代的改革：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工人文化宫 / 73

- 一、体制基础与政策环境的变化 / 74
 1. 国家文化政策的市场化导向 / 74
 2. 工会对工人文化宫的政策导向 / 75
- 二、工人文化宫的市场化转型 / 77
 1. 经济结构转型与经费来源的改变 / 77
 2. 权力结构的变化与企业化自主发展 / 79
- 三、工人文化宫空间再造与工人主体性更新 / 83
 1. 被市场化了的工人文化宫 / 84
 2. 工人文化宫社会认同感的消逝 / 87
 3. 被遗忘和被取代的工人文化宫 / 89
- 四、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失范及其动因 / 91
 1. 经济独立与重商主义 / 91
 2. 权力结构松散与体制资源匮乏 / 93
 3. 精英主义与形式主义 / 98
 4. 法律约束力薄弱与社会监管缺乏 / 100
- 小结 / 103

第四章 主人翁与新主体精神表达：“工人文艺”生产 / 105

一、“工人文艺”生产的文化政策与文化体制保障 / 105

1. “工人文艺”的政策要求与发展 / 106

2. “工人文艺”生产的文化制度保障 / 109

二、“工人文艺”的生产逻辑与文化景观：1958年至1960年上海工人话剧运动 / 111

1. 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动员机制 / 112

2. “工人文艺”的生产机制与方法 / 114

3. 作为意识形态审查机制的“工人文艺” / 119

4. “工人文艺”生产中的矛盾与问题 / 120

三、上海工人文艺经验的主体自述 / 124

小结 / 132

第五章 《于无声处》：工人文化政治的转折与先声 / 134

一、话剧《于无声处》与国家转折 / 135

1. 工人自发创作与演出的话剧 / 136

2. 对中国文艺界的震动 / 139

3. 对社会思想领域的影响 / 140

4. 与党的文化治理思想转折的关系 / 141

二、《于无声处》与“工人话剧”发展的关系 / 144

第六章 走向80年代：政策变动中的“工人文艺”蜕变 / 148

一、两种文艺治理观的冲突与阶级话语的终结 / 148

二、由计划到市场过渡时期的“工人话剧”生产 / 154

1. 文艺生产机制的通变与守循 / 154

2. 文艺意识形态的分歧与裂痕 / 161

小结 / 164

第七章 从中心到边缘：“工人文艺”的市场化转向 / 166

一、新的文艺政策环境 / 166

1. 国家文艺政策的新目标 / 167

2. 国家文艺资助方式的转变 / 168

3. 国家对主流价值观的维护与引导机制 / 169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话剧”生产的边缘化 / 171

1. 市文化宫话剧生产的新定位 / 172

2. “工人话剧”生产方式的变革 / 173

3. 创作主体的转型与文化精神被颠覆 / 180

小结 / 182

第八章 新的时代提问：工人文化宫如何走向现代？ / 184

一、新的政策要求与工人文化宫发展的新方向 / 184

1. 走向“公益性文化事业”：工人文化宫发展的新政策要求 / 185

2. 主体价值回归：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新变化与新目标 / 186

二、重新思考工人文化宫：走向以工人为主体的文化共治 / 200

1. 工人文化宫应该去向何方？ / 201

2. 新型工人文化宫的构建主体是谁？ / 202

第九章 讨论：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嬗变与创新 / 210

一、研究发现 / 211

1. 关于工人文化宫的性质与作用 / 211

2. 工人文化宫与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政策的关系 / 213

3. 关于工人文化宫文化与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 / 214

二、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治理逻辑 / 215

1. 象限Ⅰ：党的革命理念 / 217

2. 象限Ⅱ：国家文化领导权 / 218

3. 象限Ⅲ：市场经济理性 / 221

4. 象限Ⅳ：公民权益理性 / 224

三、解读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与转型 / 227

四、走向“文化政策生产”的研究 / 229

附录：“工人剧作家”的个人口述史 / 232

一、宗福先 / 233

二、贾鸿源 / 251

三、曲信先 / 264

参考文献 / 271

后记 / 283

图表目录

- 表 0-1 参加过上海市文化宫文化活动的普通受访者名单 / 17
- 表 7-1 话剧《中国制造》(2000 年)的责任分工名单 / 178
- 表 7-2 话剧《大桥》(1991 年)主要表演者名单 / 179
- 表 8-1 2012 年 9 月至 10 月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三楼展厅活动的统计表 / 188
- 图 2-1 1950 年 9 月 30 日上海工人文化宫正式开幕, 时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主持开幕典礼 / 36
- 图 2-2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赠给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大匾 / 37
- 图 2-3 上海工人文化宫开幕的喜讯在《文汇报》1950 年 10 月 1 日第一版刊发 / 37
- 图 2-4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 46
- 图 2-5 青年职工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工运史料陈列室接受教育 / 50
- 图 2-6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茶室沪上闻名 / 51
- 图 2-7 工人们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内创作舞蹈《公社的早晨》 / 55
- 图 2-8 1950 年上海总工会、纱厂工会、店员工会和市政工会共同购买东方饭店的公告(《解放日报》1950 年 5 月 14 日第三版) / 60
- 图 2-9 1950 年东方饭店的品牌标示 / 61
- 图 2-10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东方饭店 / 61
- 图 2-11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工人文化宫职工乒乓训练比赛 / 66
- 图 3-1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阅览室(摄于 2009 年夏) / 86
- 图 3-2 20 世纪 80 年代盛况空前的文汇书展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 吸引了大批求知若渴的读者 / 89
- 图 3-3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每年举办羽绒服销售博览会和各类品牌服饰会, 并常年在宫内销售各类服装, 被上海人称为“市中心的奥特莱斯” / 89
- 图 4-1 “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 108
- 图 4-2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的著名小说《骨肉》 / 111
- 图 4-3 工人们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内创作舞蹈《油漆工舞》 / 116
- 图 4-4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人文艺团上街演出宣传“总路线” / 118
- 图 5-1 话剧《于无声处》1978 年演出剧照 / 136
- 图 5-2 《人民日报》1978 年 11 月 16 日头版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 并被多家报刊转发 / 142

图 8-1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正门口《上海职工艺术博览汇》的宣传广告 / 188

图 8-2 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黄浦区职工书画、摄影艺术展》 / 190

图 8-3 《黄浦区职工书画、摄影艺术展》开幕首日 / 193

图 8-4 《黄浦区职工书画、摄影艺术展》展览第二天 / 193

图 8-5 黄浦区工人文化宫书评组的中秋诗会活动现场 / 205

图 8-6 书评组的成员正在朗诵自己创作的格律诗 / 206

图 9-1 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治理逻辑 / 216

图 9-2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文化政策的主导逻辑 / 220

图 9-3 市场经济时期至现阶段中国文化政策的主导逻辑 / 222

图 9-4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趋势 / 224

导言：文化政策研究与文化 政治经济学视角

一、选题由来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世界发达国家经历着资本主义的急速变革。这激起了学术界一轮又一轮的思想火花的不断碰撞。对资本主义变革的相关思考往往和理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总体任务联系在一起。体现于近二三十年间涌现出的许多新的表述，包括“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Lyotard, 1984）、“后现代性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Harvey, 1989）、“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Crook, Pakulski, Waters, 1992）、“脱缰的世界”（runaway world）（Giddens, 2003）、“流动的现代化”（liquid modernity）（Bauman, 2000）、“全球危机社会”（global risk society）（Beck, 1992）、“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信息时代”（the information age）（Castells, 1996 & 1998）、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neo-liberalism）（McGuigan, 2004）等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学术景观。

这些学术成果为我们绘制了一幅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变革所引发的全球范围内诸多变化过程的宏大画面：从福特式的产业经济向后福特式的更加灵活的信息经济的变动，这使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成为可能；生产事物让位

于生产意义,符号消费的时代已经来临;信息和传播技术使组织“瘦身”,高科技产品的新产品周期随之启动,并不断挑战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发达国家大都会中心成为资本与人才全球流通和定价的节点;研究、发展、设计和营销日益成为富裕世界经济活动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制造实物的体力劳动者被推向世界上的贫困地区;福利国家制度削弱、社会民主受到损害、欧洲等地的共产主义也同时遭受挫折;新的全球环境里人们被置于新的意想不到的危机与自我认知的困境中。

对于上述的这些变化,学者们的论述都指向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economic reason)对社会和时代宰制的事实。问题是:在经济理性主导的大环境下文化领域又发生了哪些深刻的转变?一些国外学者将他们的目光聚焦在文化政策研究——涉及国家对于文化治理及其影响的一系列问题上。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经济系教授大卫·索斯比在《文化经济学》(*Economics and Culture*)一书中就文化政策的整体发展的议题作出过历史性的总结^[1]。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谈论文化政策的转变,这有利于我们清楚地比对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兴起前后的文化政策领域内的差异。

索斯比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政策方面经历了三次大幅度的转变,尽管对于不同阶段的描绘会因各国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异,但整体而言,发展趋势是十分雷同的。第一个阶段发生在1950年到1960年这十年间,从国家单方面的文化供给与流通,转变为一种更多元与包容的局面。由于福利国家的出现,“文化平等”概念特别兴盛,支持艺术创作与艺术参与的机制俨然成形。当代的文化研究,将这次变革解读为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高等文化(high-culture)霸权的土崩瓦解,并认为这有利于贫民世界的文化建立,并且给少数民族与弱势团体带来了强有力的人文关怀。从政策面看,这次的转变不再将“精英”准则作为定义艺术的标尺,而是注重民众接触文化的机会与文化参与;制定政策方向时,重视地方与社区的文化价值,并且倡导多文化融合和推动文化多元性等等。第二次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兴起密切相关,私人机构取代了公共机构的文化主导地位。虽然国家依然借由文

[1] Throsby, David(2001).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45—147.

化政策保有主导和推动文化发展与转变的权力，但其权力确实已经削弱，表现为政府花在文化上的财政预算减少，并且政府权力从一些领域中退出。同时，企业界渐渐重视文化领域的商机，以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文化经济价值的观念日益增强。文化产业，被意识到是一种驱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动力，尤其是在都市范围和旅游业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里，和其他领域一样，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与变化表现出普遍性的社会变动，如撤销管制规定(deregulation)、私有化(privatization)、市场自由化(market liberalization)等。第三波转变发端于20世纪末，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文化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资本的高度流动性、通讯技术的革新，以及全球市场经济结构大变革下国家经济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强化，这些都在文化政策上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结果。比如1997年英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创意产业”的口号，随之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发展势头在全球迅速蔓延开去，这也将新自由主义带向全球^[1]。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三大转变，尤其是后两次转变，不同立场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索斯比作为经济学者，他基本赞同这种变化趋势，认同市场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然而，持批判与反思这种趋势立场的文化研究者们则认为第二波和第三波的转变把社会和文化推向了不平等与不公正，并使地方与个体身处全球化与本土化发展的两难窘境。比如米勒(Miller)和尤迪斯(Yudice)指出文化与经济的联姻往往一味强调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而压制甚至剥夺了文化民权^[2]。麦圭根(McGugian)则毫不客气地批评许多曾经有批判锋芒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形式微妙的新自由主义的宣传阵线，以为“自由”是真正的解放，却忽视了工具主义思想和研究文化本身及政策的问题^[3]。事实上，文化研究者看到的更多的是文化政策变动背后的各种紧张关系，如消费者与公民、个体的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全球市场营利与本土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等等。这是他们研究的兴趣，旨在揭开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变迁表象背后的权力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的三次转变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

[1] Throsby, David(2001). *Economics and Culture*. pp.145—147.

[2] Miller, Toby & Yudice, George(2002). *Cultural Policy*. London: SAGE.

[3] McGugian, Jim(2004). *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家是否发生了与发达国家一致的文化政策的变动趋势，又面临何种文化与政策问题？这是本研究的兴趣出发点。相对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政策的历时性研究就远不及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当然这一问题无法笼统地来回答，且尚未得到系统性的回答，尽管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只要没有禁闭国门的发展中国家都一样难逃全球化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文化政策发展研究的欠缺，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各个发展中国家本身有它们各自国家与社会的特殊问题，它们大多经历复杂的历史，甚至不少国家直至今日国内局势仍处在政权频繁更换与社会环境的瞬息万变之中，所以这类国家文化政策的演进轨迹与步伐各不相同，无法如发达国家那样有一个较为清晰而统一的时间表；其次，西方学术界对于这些国家性质的界定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将东方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法西斯混为一谈，这就影响了对这些国家文化政策性质的客观而公正的认定。另外，要获取这些国家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也比较有难度，尤其是对于非本国学者而言，更是如此。尽管本书无力对发展中国家做系统性演变过程的研究，但试图立足于中国经验，从而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政策的发展轨迹进行理论上的尝试性探讨。

本书对中国文化政策研究的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至2012年。通常这一时间段被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前，特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史家也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毛泽东时代”。西方学者用“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来形容，意指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之下，国家表现为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的一体化。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史家也有称之为“后毛泽东时代”，往往与“市场—社会主义”和“转型时期”的表述交换使用，均旨在体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以前的区别和差异。这一时期又被西方学者冠以“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标签，说明在这一时期里虽然国家政权具有绝对权威性，相对不受其他因素的约束和制衡，但在其他领域内权力出现分化，社会成员拥有了相对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

笔者赞同米勒和尤迪斯（2002：107—108）的观点，他们认为用“全权主义”的概念来统称所有非市场经济或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并在除政治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也贴上“全权主义”的标签是不准确的，因为使用

这个概念更多地反映了西方学界旨在将他者与自身加以区分的资本主义优越感。米勒和尤迪斯借用“计划经济”或“指令型经济”(command economy)的概念将非市场运作的文化配置称为“指令文化”或“计划文化”(command culture),即这种文化在实践过程中,包括规划、创造、监管与修正方面,始终以国家为核心主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将“计划文化”与全面的文化控制等同起来,因为“计划文化”也包含国家对文化客观上的扶持。此外,他们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化政策有自身的特点,是平均主义的、以工人为导向,区别于其他具有沙文主义色彩,将征服和占据霸主地位奉为英雄行为的国家政策。

米勒和尤迪斯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命题,但他们没有系统和深入研究“计划文化”这一文化政策模式在他们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发展与演进中的表现形态与存在方式,以及其间的本质差异性。今天,像中国,一些曾经与西方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已今非昔比了。就连“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用来进一步理解“计划文化”政策模式的分类也不再适用今日世界的国家形态与社会制度。就中国而言,自1978年12月改革开放国策出台后,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登上历史舞台,整个国家开始摸索新的发展方向——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并且在此过程中国家、社会、文化与阶级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带来了社会整体性的转型,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今天许多改革开放前的“遗产”尚在,但早已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改革的巨大冲击而发生了转变,包括如工会和单位体制以及价值和观念的改变,诸如“阶级”概念的重构等等。在文化领域,一方面,国内文化市场不断开放,伴随而来的是文化商品化、消费文化兴起和文化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受全球化和文化创意产业浪潮的影响,我国于2001年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第一次正式地把“文化产业”纳入文化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之中。这些重要的变化不得不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政策。“计划文化”的政策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化政策在哪些方面与改革开放之前存在哪些联系和异同?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的发展轨迹之间又存在哪些共性和差异?具体在微观层面上(如工人文化),又是怎样表现的?这正是本书所要研究和试图回答的问题。